

五四運動與國父思想

新文華

五四運動發生時，我在廣州，還是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，就讀於國立廣東高等師範附屬初級師範。

五四運動在北平發生後，很快便傳遍全國，紛起響應，形成澎湃洶湧的全國學生愛國運動。

廣東原為革命策源地，當時國父正在廣州成立軍政府，從事護法運動，雖由於桂系軍閥的跋扈專橫，國父辭職赴滬。但廣東民眾素受革命思想薰陶，學生愛國表現，更從不後人。而且自從「北京政府」於民國七年五月和日本簽訂「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」，其媚日賣國之野心，已昭然若揭，我留日學生羣起反對。其中粵籍留日前輩連聲海、丘念台、陳延炯諸先生，先後返粵至各校演講，揭發北洋軍閥的賣國罪行，各校學生已有愛國反日組織，故對五四運動的響應，非常積極激昂，而且迅即蓬勃開展，組成了全省學生聯合會，組織宣講隊，遍赴各地街頭演講，還演出愛國的話劇。抵制日貨更做得有聲有色，其後又成立了各種有關文化思想的會社，出版各種刊物，舉辦平民義學等，推展新文化運動，一時風起雲湧，影響至為深遠。

廣東高等師範當時是全省的最高學府，自然也成為全省學生運動的中心，但我當時還是附屬師範的學生，只能擔任跑龍套搖旗吶喊的角色，並沒有什麼貢獻。唯一可以勉足自慰的，就是當時我被推為高師學生貿易部的經理，部中設有書報部，我曾經運用各種方法，和北京大學出版部及其他有關新文化刊物取得密切聯絡，把許多新出版的書刊如『新青年』、『新潮』、『浙江潮流』、『新教育』以及『建設』等，介紹到廣東來，以本校貿易部作為經銷中心，再轉銷到廣州市、桂、閩其他各校及各縣市。最初廣州市各大書局如共和書局、啓明書局等對這類刊物都不表歡迎，不願代售。後來一面由我攜書親往說服，一面購閱者也漸多，所以各書局也改變態度，樂為代售了。這對於新文化運動在西南各省的發展是不無貢獻的。

也是由於這一緣故，我在當時有機會讀到各種新出版的刊物，接觸到各種新思潮。當時的刊物真是多彩多姿，衆說雜陳。自然我以一個中學生來讀這些刊物，瞭解並不深刻，但却非常興奮，每接到一份新刊物，便手不釋卷，先覩為快。

當時的瞭解雖然很膚淺，但基於當時的印象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再加分析體會，我深深的感觉：「五四運動」開始的時候，確是單純的學生愛國運動，後來才逐漸擴展成包括農、工、商各階層而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全民運動。這是以文化思潮為主導的運動，而本質上則在求中國之現代化。所以，五四運動決不能單從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前後的一段時間去探究，它必然有其更淵遠而強大的動力，這個動力當然起自思想，匯為一股信仰，再凝聚成壯大的力量。這股思想的動力，無疑地來自國父革命思想的啓迪。

大家都知道：五四運動的發生，可說是單純的偶發的學生運動，但這一運動的迅速蔓延全國，則是由於五四運動所揭露的「外爭主權，內除國賊」兩句口號，和學生們所表現的愛國情操和俠義精神，獲得了全國各階層人士的共鳴，因而商人為之籠市，工人為之罷工，形成澎湃的全民運動。學生們的愛國思想和俠義精神，則無疑地是源自國父所領導的國民革命，經多年的奮鬥，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所喚醒的民族精神，尤其是在民國建立以後，軍閥割據，內亂相尋，

國父不斷聲罪致討，指斥北洋軍閥和列強勾結，賣國求榮的罪行所喚起的民族覺醒。五四運動所高呼的「取消二十一條款」，「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」、「打倒賣國賊」等，便都是國父當時的政治主張，保衛領土主權的完整，爭取國際地位的平等，正是當時國父民族主義思想的內涵。

其後，五四運動形成一種文化、思潮運動，雖然當時思想很紛歧，很多不同的學說都被介紹進來，但當時的思想的主導則是「德先生」（德謨克拉西）和「賽先生」（賽恩斯）。這也正是國父革命思想所倡導的民主和科學，也就是他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思想的本質。而且遠在五四運動前的十年間，國父致力國民革命就已不斷倡導民主與科學。

就科學說，八十八年前，也就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，國父在上李鴻章書中所提出的四大綱領，便是科學化、近代化的建國理想和方法。當時，國父所提四大綱領及總提示：對「人能盡其才」，要做到「教養有道，鼓勵以方，任使得法」。對「地能盡其利」，要做到「農政有官，農務有學，耕耨有器」。對「物能盡其用」，要做到「窮理日精，機器日巧，不作無益以害有益」。對「貨能暢其流」，要做到「關卡無阻難，保商有善法，多輪船鐵道之載運」。國父當時是想藉上書之舉，揭示他的政治主張。在這四大綱領裏，國父對怎樣實現他的建國理想，都有很具體而科學化的說明，而不徒託空言。其後，這循科學途徑從事建設來解決民生問題的思想，

便發展成爲國父的民生主義思想。

關於民主，更是國父的一貫主張。他在自著的「中國革命史」一文中，便說：「余之民權主義，第一決定者爲民主，第二決定則以爲民主專制必不可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。」所以，遠在民國前十二年，國父在致香港總督書中，便提出憲政的主張。民國前六年十月十七日，國父在東京祝民報「紀元節」的一篇講演詞中，更進一步對五權憲法的理論，作相當詳盡的說明。在民國建立後，國父即主張制定五權憲法，實行民主，但格以事實，未能實現。他認爲要實行民主政治，必須民主國家的國民，懂得行使民權，而行使民權，必須從糾合羣策羣力的集會開始。所以，他在「民權初步」一書中，闡明開會方法。他說：

「是集會者，實爲民權發達之第一步。」可見國父不但倡導民主，而且對實行民主的制度

，步驟和方法，都有很具體的指示。

國父的民主、科學思想，逐漸發展成爲民權主義、民生主義思想與民族主義思想相結合，而成為國民革命的原動力。同時，在國民革命過程中，經過不斷的宣傳鼓吹，激盪了全國的知識分子。這種思想的潛滋暗長，使知識階層有了新的覺醒，遇到適當的時機，便爆發起來，成爲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。所以，胡漢民先生於民國十八年中央黨部五四紀念會上，以「五四運動紀念與青年今後的自覺」爲題的講演中，分析五四運動發生的時代背景說：「那時我國政治，去滿清的

專制還不遠，北洋軍閥十分猖獗，軍閥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，袁氏表面雖接受了共和，而骨裏仍承襲幾千年來的專制，爲壓制國內民黨，不得不與帝國主義者勾結得格外密些，以助長其對內的壓力，於是犧牲國家的一切，訂立種種賣身契約，都在所不惜。如山東問題、二十條款問題，都繼續發生了。歐戰告終，巴黎和會開始，不但未竭力爭回權利，而且毫無顧到國家民族的心，於是有血氣青年極爲憤慨，而產生了悲壯熱烈的愛國運動。從此全國的知識階級，對於政治，對於國家，便有了一番新的覺醒了。」

「五四運動」開始於「外爭主權，內除國賊」的學生愛國運動，其後發展爲高舉「民主、科學」旗幟的新文化運動。這一思想的發展，正和國父革命思想的發展相同。國父所領導的國民革命，也是先發揚民族精神，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」，而在民國建立以後，則以實行以民主、科學爲本質的民權、民生兩主義爲主要目的。因此，國父對五四運動的發展，深爲讚揚。他曾於民國九年一月致書海外同志，論及五四運動的影響，認爲此一運動，乃「全國人皆激發天良，誓死爲愛國運動」。並說：「此新文化運動實爲最有價值者」。

「五四運動」展開後，國父認爲應加強宣傳國民革命思想，使全國民衆對中國現代化的正確途徑，有深切的認識，他在是年六月十八日覆四川蔡冰若的信中便說：「試觀此數月來全國同學之奮起，何莫非新思想鼓盪陶鎔之功，故文以爲灌輸學識，表示吾黨根本之主張於全國，使國民有普遍之覺悟，異日時機既熟，一致奮起，除

舊布新，此即吾黨主義之大成功也。」因此，他是在年八月，便指定胡漢民、汪兆銘、戴傳賢、廖仲愷、朱執信等同志，在上海創辦「建設社」。由戴傳賢、沈定一、孫棣三諸同志出版「星期評論」宣傳社會建設。胡漢民、朱執信、廖仲愷諸同志出版「建設雜誌」，以從精神上、物質上，謀國家及社會之建設及革新為目的。

建設雜誌的出版，國父至為重視，在創刊號會親撰發刊詞說明創刊的目的：「以鼓吹建設之思潮，闡明建設之原理，冀廣傳吾黨建設主義，成爲國民之常識，使人人知建設爲今日之需要，使人知建設爲易行之事功。由是萬衆一心以赴之，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，爲民所有，爲民所治，爲民所享者。」戴季陶先生在該刊所撰「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」一文中，分析新文化運動的特質，說明建設的重要性，說：「新文化運動是什麼？就是以科學的發達爲基礎的『世界的國家及社會的改造運動』，非有大破壞不能有建設，但是一面破壞着同時就要一面建設着，各式各樣的努力，都是向着有必要到來運命的新世界走」。

記得當年我所經銷的各種刊物中，建設雜誌雖然不是最暢銷的，但却是很分量，最富建設性的一份雜誌，而且銷數日漸增加，對知識青年思想的影響也日增。所以，胡適先生曾在致廖仲愷先生函中，稱讚「建設」是五四時期「能做研究文章的好雜誌」。傅斯年先生更曾指出：「建設雜誌帶給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絕大的政治動向，是把中國推向近代化的一個重要刊物。」

由於國父思想的啓迪，激發了全國知識青年的愛國熱情，爆發了五四運動，而由於五四運動的激盪，也使全國知識青年有了新的覺醒：他們開始關心國事，對國家興亡有強烈的責任感；他們也開始關懷社會，積極參與各項社會運動。而由於他們看到國家的危亡和社會的落後，更使他們積極探求救國之道，大家都願意獻身於中國現代化運動，建設一個富強康樂和現代化的新中國。因此，各種思想學說都受到知識青年的歡迎，形成大鳴大放的新文化運動。初期思想頗爲分歧，而且偏重於對傳統的批判，而忽略了積極的建設。當時大家都認爲要「改造中國」，但怎樣改造？却意見不一。後來大家對「國父革命思想」的認識日漸普遍，更由於建設雜誌等刊物的宣傳，大家知道實現三民主義是使中國現代化的正確途徑，只有完成國民革命，才可以建設中國成爲富強康樂的國家。國父於民國八年十月八日在上海青年會，便曾以「改造中國之第一步只有革命」爲題發表演講，指出當時對改造中國，有人認爲首須普及教育，有人主張先要興辦實業，有人以爲最重要的是地方自治。國父說：「以上三種，固是改造中國的要件，但還不能認爲第一步的方法。第一步的方法是什麼？在兄弟的意見上，只有革命。革命兩字，有許多人聽了，覺得可怕，但革命的意思，與改造是完全一樣的。先有了一種建設的計劃，然後去做破壞，這就是革命。」

所以，五四運動的發展，也壯大了中國國民黨的陣容；同時，當時創辦了建設雜誌等刊物，也使黨的理論益加充實，促進了黨的改造和新生。民國八年十月十日由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，通告全黨，頒發規約，雖然和五四運動沒有直接關係，但無疑是適應當時政治情勢的需要，擴大黨的陣容，充實革命力量。

由此可知，國父領導國民革命，在思想和行動上啓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情操和民族精神，是引發五四運動最主要的動力。如果沒有「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」的國民革命，在民國八年時候不會發生這樣偉大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？是一個疑問。而五四運動的發生，促成了全國人民的覺醒，喚起了全國人民對國事的關懷和參與，也壯大了國民革命的陣容，促進了中國國民黨的改進和新生，使黨的組織日益壯大，國民革命日益進展。

政客三種陳士，去建造燦爛莊嚴的民國，深爲知識青年所信服。

由於知識青年對國父革命思想日漸瞭解，三民主義漸成爲知識青年思想的歸趣。所以，在五四運動以後，許多覺醒的知識青年都紛紛加入中國國民黨，致力於國民革命。許多五四運動的主幹，如段錫朋、羅家倫、陶希聖、楊亮功等先生，和各地響應五四運動的健將，如張茲闡、楊繼曾、葉秀峯、白瑜、阮毅成等先生，也都參加了國民黨，後來成爲黨的幹部。廣東也有梁寒操、李樸生、崔載陽、陸宗祺等先生，都參加了國民革命的陣容，而著有貢獻。

所以，五四運動的發展，也壯大了中國國民黨的陣容；同時，當時創辦了建設雜誌等刊物，也使黨的理論益加充實，促進了黨的改造和新生。民國八年十月十日由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，通告全黨，頒發規約，雖然和五四運動沒有直接關係，但無疑是適應當時政治情勢的需要，擴大黨的陣容，充實革命力量。